

清代赏四团龙补服述略

杨 虎

内容提要 赏四团龙补服是清代特有的赏赐制度,获赏之人资料星散于各典籍档案之中。本文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档案和文献为基础,梳理了清代获赏四团龙补的人物及事迹,分析了清代君臣对赏四团龙补的态度,并结合清宫旧藏实物,论述赏四团龙补服的龙纹规制及赏与准穿的问题。

关键词 四团龙补服 满汉差异 阿桂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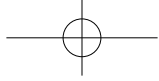
补服是明清官员穿在朝服或吉服之外的服装,因绣有补子而得名,作为官服的一部分,用以“辨尊卑,别上下”,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从形状上看,补子有方补和团补之分,团补指的是圆形补子,对应传统文化中的“天圆地方”之说,只有代表天的皇帝及近支皇族才能使用,其他人等只能用方补。文官一品至九品对应的补子纹样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鸂鶒、鹌鹑、练雀,武官一品至九品对应的补子纹样为:麒麟、狮、豹、虎、熊、彪、犀牛(武官七品、八品补子相同)、海马。五爪龙纹只能在皇帝、皇子、亲王、世子、郡王及相关的女眷中使用,贝勒以下只能用四爪蟒纹。龙纹图案本身又有正龙纹与行龙纹的分别。乾隆时,傅恒认为亲王补服“与御服无别,乃奏请改亲王服二行龙二正龙补服,郡王服四行龙补服”^{〔1〕},以后则成定制。乾隆三十一年(1766)完成的《皇朝礼器图式》定型了补服规制:皇帝衮服,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后万寿篆文。皇太子龙褂,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皇子同。亲王补服,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世子同。郡王补服,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简言之,圆形补子的等级高于方形补子;团纹越多,等级越高;正龙高于行龙,龙高于蟒,蟒高于飞禽和走兽^{〔2〕}。补服上的四团龙图案是与皇帝、皇子、亲王、郡王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对获赏者而言是很大的殊荣。

勋臣贵戚获赏四团龙补的记载星散于档案之中,早期学者整理并不全面^{〔3〕},2005年,王彦章先

〔1〕 (清)昭槁:《嘯亭杂录》页380,中华书局,1997年。

〔2〕 严勇:《清代服饰等级》,《紫禁城》2008年第10期。

〔3〕 例如《嘯亭杂录》“四团龙补褂”、《旧典备征》“冠服异数”篇、《清代文献迈古录》“冠服宠异”,都收集了清代赏四团龙补之人,但范围仅限于“大勋”之臣。



生收集整理获赏四团龙补的人物资料^{〔1〕}，但仅罗列了时间和人物，并未深入探究。通过翻阅典籍，笔者又发现了马见伯等48人获赏四团龙补记录。在梳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皇帝对赏四团龙补的态度，并结合档案与文物探讨赏四团龙补的规制。

一 对赏四团龙补的认识

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清代获赏四团龙补者共73人〔附表一〕，根据受赏之事，可大体分为恩赏、外交、军功大勋三类。

第一类恩赏者有：马见伯、高其位、李卫、史貽直、朱珪、鄂尔泰、玛呢巴达喇、策登多尔济、绵恺及嘉庆朝以后的诸王等。他们功绩逊于勋臣的军功，却得到类比勋臣的赏赐规格。赏四团龙补是皇帝个人意愿的表现，赏赐与否不仅受皇帝性格喜好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和获赏者与皇帝的亲疏程度有关。马见伯受益于康熙时千叟宴而得赏四团龙补。高其位是清代因进献祥瑞而获赏四团龙补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李卫、史貽直、鄂尔泰都是雍正时期的重臣：李卫因秉公执法受赏，清代仅此一例，“此虽小事”^{〔2〕}，但高规格的赏赐表达的是皇帝对先皇老臣的眷顾；史貽直受赏雍正四团龙遗服，乾隆皇帝一席话颇能说明原因，“此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即先帝事也。卿其始终一节”^{〔3〕}；鄂尔泰病危时，乾隆亲视榻前，“赐上所常服四团龙补服一件……命即以此殓”^{〔4〕}。朱珪是嘉庆的老师，受赏乾隆遗服。以先皇遗服、皇帝常服赐给大臣，其行为本身就带有情感色彩，传递的是皇帝对臣工的信任。其他受恩赏者或是皇帝近臣，或是皇族贵胄：玛呢巴达喇是固伦额驸，其妻庄静固伦公主是道光皇帝的嫡亲妹妹；策登多尔济为蒙古土尔扈特汗；绵恺是道光皇帝的叔伯兄弟；咸丰、光绪朝的诸王因皇帝即位、皇帝大婚、皇太后万寿诸种因素获赏四团龙补，都是恩赏。恩赏的诸种因素中，情感因素占的比重很大。正因如此，获赏者中汉人才占有一定的比例。

第二类因外交关系受赏者，如安南国王阮光平，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两人都是近藩首领，在乾隆八旬万寿时入朝恭贺寿辰，是两国恭顺臣服的表示，乾隆赏服赐物则是怀柔边远的表现。此赏政治意味更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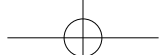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第三类是军功大勋者，如图海、施世骠、孙思克、年羹尧、岳钟琪、隆科多、傅恒、班第、萨喇勒、玛木特、策楞、兆惠、厄敏和卓、霍集斯、明瑞、黄廷桂、车布登扎布、阿桂、福康安、海兰察、长龄、僧格林沁

〔1〕 王彦章收集的赏四团龙补者：图海、孙思克、施世骠、隆科多、年羹尧、高其位、李卫、傅恒、班第、萨赖尔、策楞、兆惠、黄廷桂、厄敏和卓、明瑞、阿桂、福康安、海兰察、长龄、玛尼巴达喇、僧格林沁、端华、本格、奕劻、晋祺，共25人。参见王彦章：《清代的奖赏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五《乾隆二年正月下》。

〔3〕 《国朝先正事录》卷一三《史文靖公事略》。

〔4〕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页71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等。其中，隆科多为雍正顺利登基起到了决定作用，黄廷桂虽未身历行阵，但乾隆皇帝认为他在军需谋划之功尤大而赐服^①，其余众人则都是战功卓著的统兵将领。

二 对因军功赏四团龙补者的分析

（一）赏赐补服所反映的清王朝兴衰

清代因军功获赏四团龙补者计21人，康熙朝3人，雍正朝2人^②，乾隆朝14人，嘉庆朝0人，道光朝1人^③，咸丰朝1人，同治至宣统朝0人。综览历朝获赏人物，就会发现人数变化与清王朝兴衰是同步的：军伐武功是国力强盛与否的综合反映。康雍乾三朝，政治相对稳定，人口、经济恢复发展，八旗、绿营战力尚未衰落，奠定版图的战争基本发生在这一时期，整个清代军功赏四团龙补者基本集中于这三朝。嘉庆时，爆发湘黔苗民、川楚陕边境的白莲教、闽浙粤沿海渔民起义纷呈，清王朝由盛转衰。1840年鸦片战争始，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镇压太平天国、剿捻、第二次鸦片战争、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事变，频繁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相应的，清中期后仅2人因军功赏四团龙补，1860年以后更是再无一人。

（二）满汉差异及汉军与汉民的区别

与恩赏中汉人占有一定比例不同，军功赏四团龙补的将领中，满洲8人，蒙古6人，回部2人，汉军旗4人，汉臣仅岳钟琪1例^④。诚如《清朝文献通考》中所言，“我朝封爵之制，亲亲而外，次及勋臣，所以隆报功之典，广世禄之恩也。兹所记载首满洲，次蒙古，又次汉军。其间，以王公侯伯子男为经，以八旗为纬。若汉人以军功封者，则次于汉军之后焉”^⑤。封爵如此，赏四团龙补亦如此。

清廷对满汉的差别对待贯穿清代始终。清初涌现的张勇、王进宝、赵梁栋等汉人将领，平三藩居功至伟，张勇授靖逆将军、一等侯，王进宝授奋威将军、三等子，赵梁栋授勇略将军、一等子，都未能获赏四团龙补。图海进剿平凉，出兵前即赏给四团龙补，可见皇帝对满族官员的信任远高于汉人。道光时的杨遇春任参赞大臣与扬威将军长龄平叛张格尔，封一等昭勇侯，图形紫光阁，但未获赏四团龙补，而长龄则赏穿四团龙补。参赞大臣赏四团龙补在乾隆时早有先例：平定准噶尔的玛木特，平定回疆的额敏和卓，平定台湾的海兰察。杨遇春稳定西域之功不亚于上述三人，未获赏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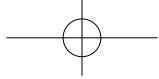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①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七六《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上》。

② 隆科多大勋非军功，不在统计范围内。

③ 僧格林沁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获赏四团龙补时，实为咸丰帝所赏。笔者将此次赏服并入咸丰朝统计。

④ 满洲：图海、傅恒、策楞、兆惠、明瑞、阿桂、福康安、海兰察；蒙古（蒙古旗人）：班第、萨喇勒、玛木特、车布登扎布、长龄、僧格林沁；回部：额敏和卓、霍集斯；汉军旗人：施世骠、孙思克、年羹尧、黄廷桂。

⑤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五〇《封建考五》。



龙补与满汉差异不无关系。晚清，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爆发，八旗绿营难堪大用，曾国藩、李鸿章等团练湘淮，拯救了清王朝的统治，但这些“中兴名臣”都未获赏四团龙补，曾国藩仅封一等侯爵，原因就在汉人身份上。如[附表一]“官职”所示，军功获赏四团龙补的前提条件是成为领军的将领。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掌军权者存有提防之心。“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属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①。以汉人身份获赏四团龙补者仅岳钟琪一人也就不足为奇。

清前期，相比汉人，汉军由于在旗的身份，受到皇帝的信任更多一些。根据徐雪梅对顺康雍乾时期地方督抚出身的统计结果，笔者粗略计算，汉军304人，汉人173人^②，随着政权逐步稳固，满汉民族间的逐步适应，八旗汉军的政治地位逐渐下降。为解决急剧膨胀的旗人人口的生计问题，乾隆发布了“汉军出旗令”，开始规模化削减汉军比例。乾隆朝以后，八旗汉军人数大为减少。汉军出旗后所遗缺额由满洲蒙古八旗补充，出旗汉军能披甲者改充绿营。因军功获赏四团龙补的汉族官员在乾隆朝以后戛然而止，其因固然与军力衰退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大规模的汉军出旗有关。汉军剧减，汉军中优秀分子积功晋爵、脱颖而出的概率就随之下降。缺少旗人身份的认定，汉人因功获赏的等级在无形中被限制了。

（三）赏服意义的差别

“恩自君出”，皇帝对臣公的赏赐存在主观随意。随着典章制度完善，在典章框架内的赏赐又受到制度的影响和制约，虽未记载于典章，却隐约成为则例。浏览[附表一]“赏赐物品”，康熙对3位军功勋臣赏赐基本围绕服饰。作为皇帝御服的一部分，赏四团龙补服与赏赐御用靴袜在意义上没有差别。雍正时，已出现勋臣晋爵和赏四团龙补并行的现象^③；同时，四团龙补服和紫缰^④并赏，说明此时的赏赐已不再是御用服饰层次的赏赐。服饰赏赐所表达的是依托于国家章制规则的等级跨越，赏四团龙补已经跳出御服的狭隘范畴，与赏赐御用靴袜等物意义上已出现明显差别。乾隆朝，冠服章制逐步完善。补服和顶子所代表的等级有了严格规定，其自身所具有的等级性使得等级跨越在赏赐中得到充分发挥。乾隆赏军功获赐服14人隐约遵循着一个规律：封爵、赏四团龙补和红宝石顶。乾隆晚年，提及傅恒时曾坦言首功勋臣的赏赐都参照傅恒例^⑤，并且这一规格显然为后世所效仿，长龄和僧格林沁所获赏赐规格都基本遵循这一规律，只不过僧格林沁获赏时，本爵已为亲王，配有红宝石顶，不必再赏。因为军功硕勋，皇帝对勋臣晋爵的同时，赏赐服饰以彰显等级跨越。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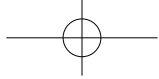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① 《清史稿》卷二九六《列传八十三》。

② 徐雪梅：《清朝官制中的满汉差异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

③ 年羹尧获赏四团龙补时晋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岳钟琪晋三等公。

④ 清制：郡王以上用黄缰，贝子以上用紫缰，镇国公以下用青缰。皇帝不可能用紫缰。

⑤ 《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五八《五阁臣五首·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



此对照，恩赏的大臣中，特别是乾隆朝以前，所赏四团龙补则是停留在皇帝御服层次。晋爵和赏服的关联发展不但是赏赐制度发展的结果，也是章服制度完善的反映。

三 对所赏四团龙补服纹饰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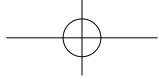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清代档案对赏四团龙补的龙纹规制鲜有明确。乾隆朝以前的龙纹并未分化，存在正龙和行龙纹混用的情况，补服的龙纹无法体现皇帝、亲王、郡王的等级。乾隆朝，四团龙纹出现分化，有四正龙、两正龙两行龙、四行龙的差别，混称四团龙补服，那么赏给臣工的四团龙补服是否也有龙纹上的差别呢？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皇帝袞服多为四团正龙纹，但有两件藏品，随附黄签均注明：“圣祖 织石青缎四团金龙面袷褂”，其中1件为：两肩绣正龙，前后胸绣二龙戏珠，龙纹实际为行龙〔图一〕；另1件为：前后两肩均绣二龙戏珠，龙纹为行龙，实为8条行龙〔图二〕。另外还有1件藏品，原名“石青缎平金团龙袷褂(对)”〔图三〕，前胸绣五爪正龙，后背绣三爪正龙，两肩绣五爪行龙，此服为正龙纹与行龙纹混用。虽然没有黄签注明是皇帝御服，但从后背的三爪龙纹可以判断此服为皇帝或皇太子所用。康熙朝《大清会典》“皇帝冠服”中明确记载“凡大典、坛庙，冠用大珍珠、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五爪三爪龙缎等项，俱随时酌量服御”^{〔1〕}，皇太子冠服里也有三爪龙纹的记载，其他等级按制不能用三爪龙纹。皇帝御服作为章服规制的最高等级，其间出现正龙和行龙混用的情况，这充分说明当时所用的龙纹还没有严格分辨，补服上的龙纹不是区别身份的标识，皇帝、亲王、郡王的四团龙补彼此之间应不加区别^{〔2〕}。值得注意的是，康熙、雍正两朝《会典》中，提及皇帝冠服时，并没有涉及补服的内容。袞服作为皇帝使用的特定称谓，就《清实录》和《清会典》而言，最早出现在乾隆朝。乾隆以前的历朝实录、两朝会典都没有出现“袞服”这个词。《实录》作为官修史书，未见“袞服”记载，对应的称呼仍笼统为四团龙褂或四团龙补，说明当时对皇帝补服的称谓并没有上升到“袞服”。从称谓上也说明，在乾隆朝以前，皇帝和亲王郡王的补服不加区别。另外，《嘯亭杂录》中昭槤也提到亲王补服“与御服无别”^{〔3〕}，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乾隆朝以前补服龙纹并未加以分别。既然龙纹规制不加分别，那么这一时期赏赐臣工的四团龙补服上的龙纹可能是正龙纹，亦可能是行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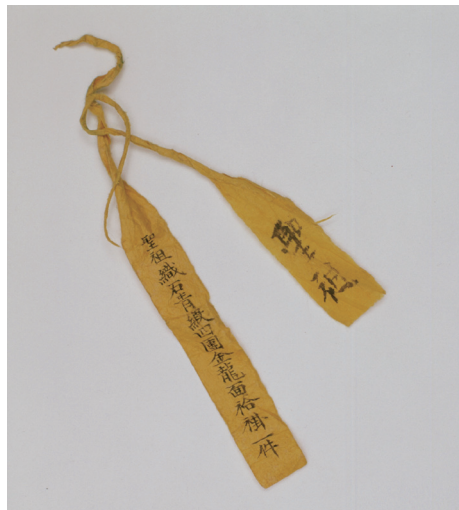
〔1〕 《大清会典·康熙朝》卷四八《冠服》。

〔2〕 昭槤的《嘯亭续录》卷一《四团龙补褂》载“旧制，亲王服四正龙补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龙补服”，意为旧制补服龙纹已经体现出等级差别。此与康熙、雍正两朝会典中关于亲王郡王补服的记载不符，两朝均沿袭顺治九年的规制，郡王补服同亲王。现存皇帝的袞服实物中亦存在二正二行龙纹，类同后来的郡王补服。可见昭槤所说旧时补服存在等级差别不足信。昭槤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对乾隆朝以前的章服规制未必清楚，此处用“旧制”一词笼统概述前朝规制，笔者以为恰恰说明这种不甚明了。笔者此处遵从《清会典》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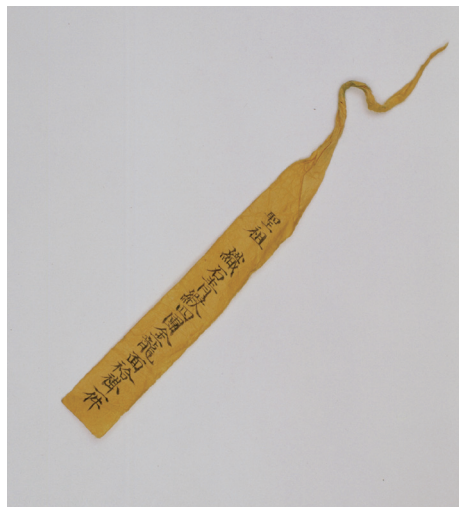
〔3〕 前揭《嘯亭杂录》，页380。



〔图一〕圣祖 织石青缎四团金龙面褂褂(双肩绣正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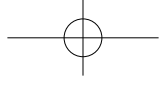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图二〕圣祖 织石青缎四团金龙面褂褂(绣行龙纹)



〔图三〕石青缎平金团龙褂褂





《嘯亭续录》还提到：“诸王有特赐四正龙者，许服用焉。”^{〔1〕}嘉庆朝及咸丰朝以后的诸王赏的都是四团正龙补，这在档案中有明确记载。

乾隆朝至咸丰朝之间的大臣获赏的四团龙补是何种规制，档案未明确记载，目前也未见实物能说明此问题。乾隆朝获赏四团龙补的勋臣中有3人画像流传于世：明瑞、傅恒和阿桂。

明瑞像〔图四〕，画中人物坐像，头戴冬朝冠，宝石帽顶、双眼花翎，披领，着四团龙补服，内衬朝服。补服前胸的龙纹为正龙纹，双肩龙纹无法辨认，可以肯定不是四行龙补。

傅恒像〔图五〕，画中人物立像，头戴冬朝冠，红宝石帽顶、双眼花翎，披领，着四团龙补服，内衬朝服，腰间佩刀。此图为紫光阁功臣像中的一幅^{〔2〕}。图中四团龙补双肩龙纹无法识别，将双肩龙纹露出的部分对比前胸正龙纹相关位置，似相同。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幅《阿桂像》，一幅作挂屏样式〔图六〕，单页。画中人物立像，头戴冬吉服冠，红宝石帽顶、双眼花翎，着四团龙补服，内衬四开襖袍。左手持书，书遮挡前胸的团龙纹。原配黄签载：“阿桂像一件，浮收听要。”另一幅为咸丰年间沈贞所绘《阿桂像》轴〔图七〕，画中人物立像，头戴冬朝冠，红宝石帽顶、双眼花翎，披领，着四团龙补服，内衬朝服，腰间佩刀。

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因平定两金川功，授一等诚谋英勇公，并赏四团龙补褂、金黄带，四开襖袍，图像紫光阁。沈贞所绘《阿桂像》轴，和《傅恒像》、《明瑞像》一样，无法辨认双肩龙纹。但《阿桂像》单页却提供了明显的证据：由于着吉服装，不带披领，补服双肩的龙纹图案清晰可辨，为正龙纹，所服即四团正龙补，显然比亲王、郡王补服规制高。另外，此补服两肩可见日月二章，左日右月，实为御用衮服。乾隆一朝，因武功获赏四团龙补的功臣成就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威名，单以功绩衡量，这些勋臣彼此之间不分伯仲，所以皇帝赏给每人的四团龙补的规制应该相同，从阿桂的这件补服可以推知明瑞、傅恒所着也应是四团正龙补，而其他

〔图四〕 明瑞像

图片取自《清史图典·乾隆卷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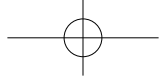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五〕 傅恒像

图片取自《紫禁城》第156期



〔1〕 前揭《嘯亭杂录》，页380。

〔2〕 聂崇正：《聂崇正先生谈紫光阁功臣像》，《紫禁城》，2008年第1期。



〔图六〕阿桂像（单页）



〔图七〕阿桂像（轴）



“十全武功”的功臣获赏的也应是四团正龙补，而且很可能皇帝将御用衮服赏给勋臣。道光皇帝对长龄的封赏基本遵循乾隆时期的成例，所以笔者以为长龄所获四团龙补也应为四正龙补。僧格林沁在道光三十年(1850)所获四团龙补为正龙补，这在档案里已明确，咸丰时又因平定太平天国北伐军，稳定京畿而再获赏四团龙补，皇帝于养心殿行抱见礼，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所获的四团龙补又怎么会比第一次的规格低呢？笔者以为他的两件补服都是四正龙补。

乾隆朝开创了清代功臣图像紫光阁的先河，以后各朝皆以为例。军功赏四团龙补者多数图像紫光阁，见〔附表一〕，这些功臣像全部在清末动荡中流散了。现存着四团龙补的紫光阁功臣像，仅见《傅恒像》轴与《阿桂像》轴^{〔1〕}，因为披领遮住两肩的龙纹，从朝服像中无法判断规制。因此，故宫藏《阿桂像》（挂屏样式单页）就显得弥足珍贵，它为军功赏四团龙补的规制提供了重要证据。

乾隆朝至道光朝，恩赏四团龙补的大臣中：鄂尔泰、朱珪，所赏均为皇帝御用，必是四团正龙服；贝勒绵偲作为近支皇族，获赏的四团龙补能够称得上“特沛殊恩”^{〔2〕}，也应是四正龙补；土尔扈特汗全称为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始封于渥巴锡，土尔扈特部诸封爵中仅此一汗^{〔3〕}，其地位堪比亲王，策登多尔济本爵补服即为亲王式，其获赏之四团龙补必为高于亲王的四团正龙补；玛尼巴达喇作为固伦额駙，其补服规制同贝勒，所获四团龙补目前尚不能断定其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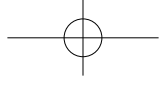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安南国王阮光平则与前例有所不同。乾隆本拟照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4〕}赏赐，后改赐皇子规格的四团正

〔1〕 《阿桂像》轴为咸丰年间沈贞摹绘。聂崇正先生认为此图摹自乾隆年间原作。笔者遵从此观点。参见聂崇正：《紫光阁功臣中的〈阿桂像〉轴》，《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6期。《明瑞像》为坐像，与《阿桂》、《傅恒》的立像有所不同，目前笔者未见有关文章论及《明瑞像》是否为紫光阁功臣像。

〔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三《宗人府》。

〔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三《土尔扈特部》。

〔4〕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四九《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下》。



龙补^①。显然赐藩属国王的四团龙补规制本应为两正龙两行龙，皇帝因为需要而临时改变了规格。由此亦可说明，赏四团龙补不一定是四正龙补服。

四 赏与准穿

前述所涉及的档案中有些明确记载赏大臣的四团龙补实际就是皇帝的御服。皇帝的御服大臣能穿吗？由于赏四团龙补并没有作为典制记载于文献中，笔者只能通过现有的档案管窥这一问题。

（一）赏未必能准许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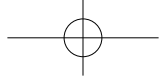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皇帝赏给大臣的四团龙补未经特许是不准穿着的。年羹尧被弹劾的91款罪状中就有“伊子穿四团补服”^②，此为僭越之罪。乾隆十四年(1749)一月，见大金川问题处于胶着状态，乾隆皇帝遂命傅恒班师，诏封傅恒一等忠勇公，赏给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未料大金川土酋于当月表乞降意，二月，土酋率众降，大金川初定。此实出乾隆皇帝意料。其后的上谕云：“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奏报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前已晋爵封公，酬庸更无殊典，所赐四团龙补褂着只受服用。”^③傅恒获赏时大金川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当大金川问题得到解决后，皇帝才觉得对傅恒的功劳“酬庸更无殊典”，遂令“所赐四团龙补褂着只受服用”。很显然，赏给傅恒的四团龙补开始时并不允许其服用，后来作为恩典才特许其服用。从相关记载看，清中后期获赏大臣可“常服之”、“准予穿”、“准即时穿”、“赏穿”(见[附表一]“赏赐”)，说明这些四团龙补是可以服用的。现存档案中含有“准穿”的内容很少，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部分臣工获赏的四团龙补确实不得服用，另一方面，也有档案记载比较简单，忽略了“准穿”内容的状况。如《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上”对于赏阿桂四团龙补，只记载“著加恩封为头等诚谋英勇公，并赏四团龙补褂、金黄带、以昭崇奖”，并未明确准穿。但在《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上”中有“阿桂既已赏给宝石顶、四团龙补褂、金黄带、令其服用，著再加恩赏穿四开襖袍”，说明阿桂所获四团龙补可以服用。乾隆对十全武功首功之臣^④必赏四团龙补，档案虽未明确，但参照“傅恒”“阿桂”例，亦会被“准予穿”。受档案限制，其他受赏大臣能否服用目前尚无法断定，但史贻直、朱珪所获四团龙补为大行皇帝遗服，必不能服。

① 《乾隆御制诗集》五集卷五九《安南国王阮光平乞遵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

②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

③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四。

④ 乾隆在《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提及阿桂为首功，见《御制文二集》卷二八《碑文》；在《五阁臣五首 故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中提及傅恒、兆惠为首功，见《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五八。



（二）何种场合穿着

获赏臣工何时穿着四团龙补，《清会典》和《清实录》未作明确记载。傅恒在获赏穿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后，上书恳辞。乾隆上谕：“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因朕赏给四团龙补服……并请于朝贺大典之日，遵旨服用，其寻常仍服公品级补服。……著于朝贺典礼之时，时常服用，不必恳辞。其寻常入朝入部办事，应从所请，随宜即用公品级补服，以成谦挹之美。”^①乾隆的上谕中还有：“朕思章服之荣，原以旌有功而励臣节。从前勋旧大臣蒙赐者，皆时常服用，若仅用于朝贺典礼之时，而寻常入朝又旋易本爵服色，转觉参差非礼。嗣后入朝，著即遵前旨时常服用，其入部及在家，听其自便，以终成大学士之谦吉。”^②《行素斋杂记》载：光绪己丑正月，皇上大婚礼成，特赏礼亲王世铎四团龙补服，准其带章。带章者，织为日月象，定制为皇太子服^③。故非遇大朝贺，礼邸不敢服。^④

“从前勋旧大臣蒙赐者，皆时常服用”，“时常”的范围包括朝贺典礼、入朝、入部及在家。傅恒因为“谦挹”，入部及在家时不敢擅服。以上内容判断，准穿者朝贺、入朝、入部、在家均可着所赐四团龙补。

（三）“准穿”原则

赏穿黄马褂殊荣的大臣，可以根据黄马褂的式样自己制作^⑤。然四团正龙补由于其特殊的等级特点，皆出自江南三织造或京内织染局，官民不得擅服擅制，违者治罪。“清律”载：

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及四爪暗蟒之四团补、八团补、缎纱，官民不许穿用。其大臣官员，有特赐五爪龙衣服及缎疋，无论色样，俱许穿用^⑥。若颁赐五爪龙缎、立龙缎，挑去一爪穿用。若官员军民人等有违定例滥用者，系官革职，平人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失察官交该部议处。衣服入官。

成造违式服舍之工匠，私下与不应用之家制造服色鞍辔者，杖一百。居官服舍违式者，罢职，仍杖。成造违禁龙凤纹之工匠，平人滥用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立龙团补、四爪

①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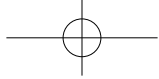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②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五。

③ 雍正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后，皇太子仅见于康熙朝的胤初和乾隆六十年九月至十二月的颢琰。清五朝会典中关于皇太子冠服的规定均未见带章之说，皇太子龙褂带章之说应为误传。

④ （清）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页33，上海书店，1984年。

⑤ 前揭《清代的奖赏制度研究》。

⑥ 此处所言似与前述“准穿”内容矛盾。如果赏赐四团龙补俱可穿用，又何必在档案中多言“常服之”、“准予穿”“准即时穿”“赏穿”，笔者以为，“准穿四团龙补”与“赏四团龙补”是两个规格的赏赐，而此处的“特赐”包含“赏”与“准穿”两层意思。



暗蟒四团补、八团补缎纱者，枷号一个月，徒三年，杖一百……^{〔1〕}

“准穿”仅仅是针对赏赐的四团龙补服而言，即使已获得“准穿”资格，除了所赏四团龙补外，大臣依然不能自制四团正龙补。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二十九日上谕载：“蒙发下四团龙补褂料三十件令臣等拟赏，谨将宗室亲王郡王及御前行走之蒙古亲王郡王等二十三人，各拟赏一件……再此项补褂料系四团正团龙，应传知各王等除此次蒙赏之件准其穿用外，余仍照旧例不得滥行穿用。”^{〔2〕}僧格林沁曾两次获赏穿四团正龙补。如果和黄马褂一样，获赏穿四团龙补的臣工可以根据样式自制的话，那么后来咸丰皇帝赏给僧格林沁四团龙补就显得意义不大。从第二次赏四团龙补的事实也可以反证准穿四团龙补的大臣不得自制四团龙补服。

结 语

四团龙补服作为清代皇帝、皇子、亲王、世子、郡王的专有官服，和其他冠服一样，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笼统到细化完善的过程。康熙、雍正两朝《会典》中，皇帝冠服的内容中并未涉及补服，亲王、世子、郡王的补服混同。乾隆朝，通过龙纹章制的组合，划分了皇帝、皇子、亲王、郡王补服彼此之间的等级，补服称谓上则出现袞服、龙褂、补服的区别。从军功赏赐上看，随着冠服制度的完善，赏四团龙补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早期仅作为皇帝御服的一部分赐给勋臣，和赏赐臣工御用的衣帽靴袜本质上没有区别；乾隆后，勋臣所获四团龙补多是四团正龙纹补，其规格远高于自身品级的补服，亲王郡王补服规制亦在其下，赏服更和晋爵联系在一起，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与赏带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在清中后期泛滥不同，四团龙补由于章服规制的特殊性，赏赐始终保持在极小范围内，且满汉界限不可逾越。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宫廷部房宏俊、严勇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1〕 《大清会典·雍正朝》卷一六四《刑部·律例十五 礼律》。

〔2〕 何林夏：《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册，页83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附表一〕清代受赏四团龙补人物表

	人物	时间	官职	事件	赏赐物品	图形 紫光阁	出处(为赏赐物品的 引文出处)
康熙朝	图海 (满洲正黄旗)	康熙十五年	抚远大将军	进剿平凉	赐御衣帽、团龙补褂、黄带、靴袜及御承名马二匹，散马二百匹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五年二月
	孙思克 (汉军正白旗)	康熙三十五年	参赞大臣	昭莫多战役后入觐	赐御书“绥怀堂”额及瑞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马		《满汉名臣传》，页758
	马见伯 (汉人)	康熙五十二年	镇守山西太原等处地方副将管总兵官事	康熙六旬万寿	赐御用海龙皮帽，万寿无疆缎袍，四团龙缎褂，五爪龙缎袜缎靴		《万寿盛典初集》卷五三
	施世驄 (汉军镶黄旗)	康熙六十年	福建水师提督	平定台湾朱一贵	赐东珠帽、黄带、四团龙补服		《满汉名臣传》，页631
雍正朝	年羹尧 (汉军镶黄旗)	雍正二年	抚远大将军	平定青海	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缰及金币		《满汉名臣传》，页926
	隆科多 (满洲镶黄旗)	雍正二年	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圣祖仁皇帝实录》、《大清会典》、《明史》总裁官		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及鞍马紫缰		《满汉名臣传》，页584
	高其位 (汉军镶黄旗)	雍正二年	江南提督	进龙纹未刻玉印	四团龙补及数物		《满汉名臣传》，页809
	岳钟琪 (汉人)	雍正二年	奋威将军	平定青海	授三等公加世袭，并赐四团龙褂、五爪龙袍		《奏为奉旨授三等公恩加世袭并赐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谢恩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0-0014-006
乾隆朝	史貽直 (汉人)	高宗御极之初		以旧臣入觐，伏谒梓宫	赐世宗所遗四团龙补服		《国朝先正事录》卷一三《史文靖公事略》
	李卫 (汉人)	乾隆二年	直隶总督	诚亲王府护卫库克同安州民争空淤地案执法秉公	四团龙补服		《满汉名臣传》，页1908
	鄂尔泰 (满洲镶蓝旗)	乾隆十年		病危	赐上所常服四团龙补服一件，金字经被一床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页719
	傅恒 (满洲镶黄旗)	乾隆十四年	经略	平定金川	封一等忠勇公，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	是	《满汉名臣传》，页1309
	班第 (蒙古镶黄旗)	乾隆二十年	定北将军	平定准葛尔	封一等诚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金黄条朝珠	是	《满汉名臣传》，页1288
	萨喇勒 (蒙古镶黄旗)厄鲁特人	乾隆二十年	定边右副将军	平定准葛尔	封一等公，赐超勇号，赏宝石顶，四团龙补服。	是	《满汉名臣传》，页1266
	玛木特 (厄鲁特人)	乾隆二十年	参赞大臣	平定准葛尔	封三等公，赐号信勇，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常服之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页944
	策楞 (满洲镶黄旗)	乾隆二十一年	定西将军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封一等公，赏戴双眼花翎，宝石帽顶，并四团龙补服，后停封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〇六《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上》
	兆惠 (满洲正黄旗)	乾隆二十三年	定边将军	平定回疆之黑水围之役	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是	《满汉名臣传》，页1324
	厄敏和卓 (吐鲁番回部人)	乾隆二十三年	参赞大臣	平定回疆之黑水围之役	赐郡王品级，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是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页913



[续附表一]

	霍集斯 (乌什人)	乾隆二十三年		平定回疆之黑水围之役	封固山贝子加贝勒品级， 赐四团龙服，红宝石顶	是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页950
	黄廷桂 (汉军镶黄旗)	乾隆二十三年	陕甘总督	平定西域过程中后勤军需筹备调度	由骑都尉晋三等伯，加赏 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是	《满汉名臣传》，页1153
	明瑞 (满洲镶黄旗)	乾隆三十三年	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 洵授将军	征缅甸	封一等诚嘉毅勇公，赏给 黄带子、红宝石顶、四团龙 补服服用	是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〇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上》
	车布登扎布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	乾隆三十九年	封亲王，赐“超勇”号，先后任定边左副将军，定边右副将军	七十寿	赐无量寿佛及珊瑚朝珠、四团龙服	是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页656
	阿桂 (满洲正蓝旗)	乾隆四十一年	定西将军	平定两金川	封头等诚谋英勇公，赏用 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	是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〇〇《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上》
	福康安 (满洲镶黄旗)	乾隆五十二年	将军	平定台湾	封公爵，赏红宝石帽顶， 四团龙补褂	是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九四《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
	海兰察 (满洲镶黄旗)	乾隆五十二年	参赞大臣	平定台湾	封公爵，赏红宝石帽顶， 四团龙补褂	是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九四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
	阮光平 (安南国王)	乾隆五十五年		乾隆八旬万寿	于热河赐国王九次，其中有四团龙补服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三九七《礼部·朝贺》
	拉特纳巴都尔 (廓尔喀)	乾隆五十五年		乾隆八旬万寿	赐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蜜蜡朝珠，佩带荷包等物		《八旬万寿盛典》卷二一《圣功四》
	朱珪 (汉人)	嘉庆四年		召见于永思殿，命值南书房，管理户部三库事务。	赐大行皇帝遗服四团龙褂		《满汉名臣传》，页3516
嘉庆朝	宗室亲王郡王及御前行走之蒙古亲王郡王等30人，	嘉庆十一年			赏四团正龙补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1册页839
	玛呢巴达喇 (蒙古土默特人)	道光八年	御前大臣	张格尔乱平定，在廷臣工，分别施恩。	赏给四团龙补服，支食贝勒全俸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三二《道光八年正月》
	长龄 (蒙古正白旗)	道光八年	扬威将军	平定张格尔乱	封二等威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紫缰，并准即行穿用四团龙补服	是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三七《道光八年六月》
	土尔扈特汗策登多尔济 (蒙古土尔扈特)	道光九年		因在平定张格尔乱中积极筹备军需	赏三眼花翎、四团龙补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五五 《道光九年四月》
	贝勒绵偲	道光二十五年		七十生辰	赏穿四团龙补服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三《宗人府》
	僧格林沁 (蒙古科尔沁旗)	道光三十年	科尔沁郡王，左翼监督		赏给四团正龙补服，准予穿	是	《清史列传》，页3525



[续附表一]

咸丰朝	僧格林沁 (蒙古科尔沁旗)	咸丰五年	科尔沁亲王, 参赞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林凤 翔北路军	〈上御养心殿,行抱见 礼〉,赏朝珠一盘,四团龙 补褂一件	是	《文宗显皇帝实录》卷 一六七《咸丰五年五月上》	
	醇郡王奕譞	咸丰元年		咸丰登基	赏四团正龙补		《三织造缴回档》,“咸丰 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钟郡王奕诒	咸丰元年		咸丰登基	赏四团正龙补			
	孚郡王奕譔	咸丰元年		咸丰登基	赏四团正龙补			
	郑亲王端华	咸丰十年		咸丰三旬万寿	赏穿四团正龙补			
信郡王本格	光绪 十五年	光绪大婚		赏四团正龙补服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二六五《光绪十五年正月 下》			
庆郡王奕劻								
礼亲王世铎								
光绪朝	博多勒噶台亲 王伯彦讷谟祜	光绪 十六年		光绪二旬万寿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二八〇《光绪十六年正月》
	克勤郡王晋祺	光绪 二十年		慈禧六旬万寿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 三三二《光绪二十年正月 上》
	宣统朝	善耆		光绪 三十四年	宣统登基		赏给四正龙补服	《大清宣统政纪》卷三

[作者单位: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 宋仁桃)